

yu yan yan jiu xin shi jiao cong shu

ci zhang ti cai

feng ge xue

辞章体裁风格学



修辞体裁风格学是集我国古今文章学、文体学、

邵颐寿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YUYAN YANJIU
XINSHIJIAO CONGSHU
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
主编 黎运汉



YUYAN YANJIU
XINSHIJI CONGSHU
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

主编 黎运汉

辞章体裁风格学



郑颐寿 著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优秀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辞章体裁风格学 / 郑颐寿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8. 10
(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
ISBN 978 - 7 - 81135 - 200 - 9

I. 辞… II. 郑… III. ①汉语—语法学 ②汉语—修辞学 IV. H14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5065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517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4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黎运汉

常 务 编 委：（按音序排列）

郭 熙	何自然	黎运汉	刘焕辉
屈哨兵	邵敬敏	肖沛雄	曾毅平
郑颐寿	周国光	宗廷虎	

编 委：（按音序排列）

曹德和	曹 炜	陈青松	戴仲平
丁金国	冯广义	冯寿忠	郭 熙
韩荔华	何自然	胡范铸	黄丽贞
黎运汉	李 军	刘大为	刘凤玲
刘焕辉	刘惠琼	刘街生	陆丙甫
罗 丽	邱冬梅	屈哨兵	邵敬敏
盛永生	苏金智	汪国胜	吴礼权
肖沛雄	谢旭慧	许光烈	曾毅平
张力军	郑荣馨	郑颐寿	周国光
宗廷虎			



YUYAN YANJIU
XINSHIJI YU CONGSHU
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
主编 黎运汉

辞章体裁风格学



郑颐寿 著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优秀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总 序

去年6月暨南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杜小陆先生邀请我为他们出版社主编一套语言学丛书。始初我有些犹豫,但为他的眼界和气魄所感动,而且觉得这是响应社会发展、对语言科学召唤的善举,便欣然应诺了。

丛书筹备工作进展很顺利,很快便得到了20多位学者朋友的赞许与支持。去年7月和今年4月,暨南大学出版社徐义雄社长先后两次诚邀部分编委举行了丛书策划论证会,深入讨论了丛书选题运作的相关事宜,确定丛书名为“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丛书的核心思想为“创新”:课题新、理论新、语料新、方法新,力求凸显研究对象的新规律、新特点,洋溢时代气息,体现学科走向,给读者以新的启示。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是学科前进的关键,只有创新才能给语言学增加新鲜血液,使其健康发展。而创新的基础是继承和吸收。继承、吸收与创新融合是语言科学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也是语言科学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及其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我们撰写这套丛书既注意继承优秀传统,吸收已有成果的精华,更努力于开拓创新。

这套丛书由30本组成,于2008年10月、2009年8月和2010年8月分三批出版。

丛书数量大,内容广泛而丰富多彩。涵盖语言理论、语言本体、语言运用和语言教学的范围,涉及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方言学、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辞章学,以及港台语言、网络语言、广告语言、导游语言、交际语言艺术、语用与文化、语用与教学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国家、省部级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成果,有影响较大的学术专著的拓新或再构,有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新著。我们期望丛书的问世能对现代语言科学以及与其有关学科的繁荣发展有所贡献,对语言学、文艺学、文章学的教学有所帮助,对语言科学的研究者有所启示,对社会公众提高语言运用的能力有所裨益。

丛书的参撰者是海峡两岸长期从事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教学和研究的的老中青教授、博士,他们学术造诣较深,眼光敏锐,视野开阔,颇有探索、拓荒精神,曾出版、发表了不少学术专著和系列论文,而且都以严谨、务实、求新、求精的科学态度,潜心耕耘自己的课题,竭力使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学术性、科学性、实用性、启示性。毫无疑问,丛书的每一分册都是作者多年从事语言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智慧结晶,我相信读者朋友们都能从中发现自己喜爱的闪光点。

丛书成立编委会。由本人任主编,郭熙、何自然、刘焕辉、屈哨兵、邵敬敏、肖沛雄、曾毅平、周国光、郑颐寿、宗廷虎等教授为常务编委,作者为编委。作者提交

的书稿经丛书编委会审定，由主编和常务编委签署意见后，交由出版社出版。全套丛书行文体例大体一致。尽管编委共同努力把好质量关，但由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所限，这套丛书的编写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暨南大学出版社欣欣向荣，富有活力，一贯重视图书出版质量。出版的图书在新闻传播学、语言文学、心理学与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已形成优势和特色，诸如《中文》等系列华文教材在海内外享有盛誉，“院士科普书系”200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次把“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和全国新闻学教材系列、“海外华文文学丛书”等同列为重点图书，更显示出令人钦佩的远见和魄力。我作为主编，代表全体作者向暨南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诚挚感谢各位作者朋友对我的大力支持。

黎运汉

2008年国庆节

于暨南大学羊城苑得道居

集大成之力作

——《辞章体裁风格学》序

几天前，收到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郑颐寿先生寄来的一摞辞章学论著：《大学辞章学》、《辞章学辞典》、《辞章学发凡》及其新著《辞章体裁风格学》打印稿，要我为之作序。我为郑先生勤奋笔耕的精神和不断开拓、创新的勇气和毅力所感动。我和郑先生的学术交往有二十几个春秋，对他的学术研究路子比较熟悉，对他的憨厚更为了解。他一贯真心实意地支持同行专家，热心学会工作，助人为乐，也甚得同行专家的首肯。著名的语言学家张寿康、张静、王德春、王希杰、张德明教授，著名的修辞学史专家宗廷虎、袁晖、陈光磊、吴礼权、高万云教授、博士，海峡彼岸最权威的辞章学家陈满铭教授，等等，都为他写过书评，肯定其重大成就。在学术上，他们之间还有真诚的建议和互助。学术界的这种氛围令人振奋。

郑先生的新著《辞章体裁风格学》包含着“辞章体裁学”、“辞章风格学”两门辞章学的下位学科，它是被誉为“辞章学史上第一座里程碑”的《辞章学发凡》的引申与发展。他从言语艺术运用（含说、写、听、读）的综合需要出发，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又挖掘我国古代富有民族特点的文章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创建了汉语辞章学；在现代汉语语体学研究趋向繁荣之际又审时度势，挖掘我国有几千年传统的文体论遗产，创建了辞章体裁学；在现代汉语风格学取得空前的历史性成果之时，又挖掘我国先秦以降的风格论瑰宝，建立了辞章风格学。这本《辞章体裁风格学》可以说是集我国古今文章学、文体学、语体学、风格学之大成的力作。它给现代汉语修辞学、语体学、风格学等新园圃繁殖了新的品种，为言语艺术的春天增添了一束新芳。

新学科的建设谈何容易，它是建立在前贤今秀研究的深厚而坚实的基础之上，又经过郑先生二十几年“朝斯夕斯”的磨砺，包括其中走过的一些弯路才取得的。纵观郑先生的研究历程，尤其是本书的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我把它归结成“四新”，以之与作者和广大读者交流。这就是“课题新、理论新、方法新、思维新”，“四新”使本书具有民族性、时代性，从而更贴近现实，更适合于运用。

一、课题新

《诗经·大雅》有句名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表述了我们老祖宗对

“旧”与“新”的辩证法。我国古代有关辞章、文体、体性风格的理论是“旧邦”的文化瑰宝，但都难免受到时代的限制，其中，有的是零珠片玉的，有的是浑然一体的，还未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郑先生和志同道合的学者，搜集了数以万计的辞章论辞条，并请郑韶风协助，逐条地分析、排比，编制专题目录索引和音序索引，建构成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主编成百万言的《辞章学辞典》（见该典《前言》），得到冰心先生的赞许，高兴地为之题写书签。翻阅该典，发现其中仅辞目就达90码，而“语体、文体论”（第70~76页），“风格论”（第49~70页）的辞条就达1800多条，条分缕析地建构其系统。在这“厚积”的基础上，又吸收了现代科学的语体学、语言风格学的研究成果，借鉴西方先进的理论，加以融化，先写成“辞体”、“辞风”的教材（编入《辞章学新论》一书），给硕士班、博士班作试讲，在几所高校作专题学术报告，反复试验，提炼升华，才形成了原创性的“辞体学”、“辞风学”两门辞章学的下位“新”的学科。作者踏实的学风、所付出的劳动及艰辛的程度，令人敬佩。

二、理论新

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理论所作的新解。作者认为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每一门学科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当时哲学的制导。为了研究始于先秦之辞章学及其分支学科，作者凭借其厚实的国学素养，从中华元典中探求当时的哲学思想，用数学概括其“密码”，即“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和“一分为多”，其实质就是朴素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哲学观。他既坚持了“二元对待”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又包容了被誉为“东方密码”的“一分为三”，还展示了由此派生的“一分为多”的中国古代的系统论。作者总结了自己二十多年来的这种研究的历程。这样既描绘了原汁原味的中国古代哲学论，又验证之于马克思主义。这是作者建立辞章学及其分支学科原创性理论的秘诀。众所周知，哲学思想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核心依据，是决定学科科学性的关键因素。郑先生的《辞章体裁风格学》理论体系植根于我国传统的唯物辩证思想，又吸取外国先进的哲学养料，还注入了自己艰辛培育的成果，因而根深叶茂，茁壮挺拔，富有旺盛的生命力，且能为学科指明研究的路向。

总体来讲，作者用哲学“密码”统帅、制导其“三观”理论，即宏观的“四六结构”理论；中观之八大律：诚美律、表心律、适境律、常格律、变格律、得律、协格律和化畸律；微观之三种语格的九组变化规律，从而构成严密的科学体系。

从具体的学科理论讲，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论。例如：

辞体方面，在中外名家陈望道、张志公、俄国M.科仁娜的辞体、文体、语体“功能”二分（实用体、艺术体）的基础上，补充了“融合体”（又称“交融体”、“混合体”）。这就是语体、辞体“功能”三分的新理论，体现了“实用体”与“艺术体”的排斥性和渗透性（即“融合体”），更符合“一分为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对信息的载体（媒体），在古代称“口笔论”（又称“言文论”、“言书论”），现代中

外语体学家将其分作“口头语体”、“书面语体”，在这种“二分”法的基础上，总结最新媒体现象，提出“口语”、“书语”、“电语”的三分法。这种观点已被不少学者所接受和引用。

风格方面，有不少理论也是别出机杼的。例如，从中华元典的文化思想所讲的“天之象、地之形、人之气、文之格”的深层关系，探赜索隐，论析风格源流；从“四六结构”这一立体的、双向的、动态的关系来论析风格的形成论、优化论、鉴赏论、功能论、类型论，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不仅可以“意会”，而且可以“言传”。

上面仅是举例，其他诸多原创性的新理论将结合以下各点作评介。

三、方法新

方法，如同过河的桥与船。有了好的方法，许多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辩证法，已如上述。此外，数理法、图表法、比较法、归纳演绎的逻辑方法都是不可少的。而郑先生善于把诸多方法综合起来运用。下面谈到“思维新”时将结合方法论进行论析。这里只讲图表法与逻辑法中的两个例子。郑先生以中国最古老的“太极图”（如确为伏羲氏所画，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它是阴阳两个对立统一的哲学“符号”，把它与新潮的坐标原理对应起来，论析世界万事万物（包括辞体、辞风）对立统一及其消长变化的规律，这就把辩证法、数理法、图表法、比较法都综合起来运用了。韩国人就用“太极图”（“两仪”）作为国旗图案的核心组成部分；德国的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就是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中受到启发，发明了“二进制”数论。郑先生不搞“出口转内销”，而是将“地道”的中华哲学论与新潮的坐标法结合起来论析辩证法。这就既富民族性，又具时代性。又如，郑先生从《墨子·经上》“言”、“闻”、“所言”、“所闻”与“实”、“言”、“举”的关系中（见《文艺修辞学》，第44~46页），从儒家的相关理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中进行提炼，创立了“四元六维结构”的理论。这要归功于逻辑的“归纳”法（请阅郑颐寿《先秦修辞理论与“四元六维结构”》，见《艺文述林》语言学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据此，郑先生演绎出了“辞章信息论”、“辞章表达（生成）论”、“辞章鉴识（解读）论”、“辞章双向互动交际论”、“辞章作用、效果论”、“四元世界论”、“辞章定位论”、“辞章定义论”、“辞章性质论”、“三辞三成说”、“辞章体系论”、“四在效果论”、“结构组合结合论”、“修改性质论”等26个由“四六结构”演绎出的派生的原创性的分论（《辞章学发凡》，第79~97页）。这些理论就融汇在本书之中。例如，由辞章的定义演绎出本书“辞风”、“辞体”的定义，这样就形成了严密的理论体系，整个学科也会站起来。

四、思维新

不管是艺术思维还是逻辑思维，都要创“新”。郑先生根据辞章学具有突出的融

合性和民族性这些特点，而采用融合其“综合与分析”的立体的动态的整体性思维模式，观察、分析辞章现象，从而抽象出许多新的理论，建立了既古老又年轻的汉语辞章学及其诸多分支学科。这个思维是从“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的哲学“密码”中派生出来的。作者把辞章定位在“话语”之“一”的整体上，以“话语”为中心。推而广之，也是以“话语”特征的总和作为辞章体裁、辞章风格“定性”的单位，这是“综合”。这种“综合”之“定性”来源于“定量”的分析之中，作者提出的“体素”、“体素值”，含其“大值”、“小值”、“正值”、“负值”、“增值”、“贬值”，“语体平面”、“辞体平面”、“12语（辞）体区”、“功能度”、“媒体度”、“9900平方度”，“格素”、“内蕴情志格素”、“外现形态格素”、“主观格素”、“客观格素”等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它丰富了语体学、风格学的理论体系，也是汉语辞章体裁学、辞章风格学术语体系和概念表述日臻周密和精确的标志之一。其早先发表的此类论文已被写进修辞学史书中，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誉。本书进一步把此类“综合”与“分析”用哲学的观点“融合”起来，它把许多高深、复杂的理论问题简明化、系统化、科学化了。这是颇有价值的创造。

思维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理论植根于实践。郑先生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辞章学、辞体学、辞风学体系，是对几千年来辞章、辞体、辞风实践的观察和分析，是从前贤今秀的先进成果中概括、升华出来的精髓。郑先生又主编了《辞章学辞典》，独著了《辞章学概论》、《辞章学发凡》、《辞章学新论》、《诗话词话辞章学》（研究生班讲义），发表了系列论文，主编合作了《辞章艺术示范》等系列书三百多万言，又用于给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作教材，反复实践，历时二十多年。洒下这些实践的汗水，才浇开辞章学、辞体学、辞风学的新葩！

以上“四新”使这本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实用性。这就是浓厚的汉民族色彩，鲜明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作者认为，文化上“最富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近一个世纪，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我国修辞学、语体学、风格学研究以鲜明的民族特点开放在中华文化的园圃之中。二十一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东方文化受到世界的青睐。“国学热”，包括“易经热”、“老子热”和“华语热”等方兴未艾。作者在学习、研究现代汉语修辞学、语体学、风格学这些富有“中华风”、“民族味”学科的基础上，又向五六千年来中华传统的文章论、文体论、风格体性论中深挖宝藏，建立汉民族“自己的”辞章学及其分支学科，更增添了上述新学科的民族色彩。其中，所吸收的一些西方对我有用的东西，都已民族化，融进了自己的学科之中。

学科的民族化是学科科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研究“一只手向古代”要精华，“一只手向外国”要先进，这是学科民族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郑先生研究辞章体裁风格学在这方面也给了人们有益的启示。

语言学被一些人喻为“文科的数学”，抽象、枯燥、难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新的学科建设，虽然不得不讲些理论，不得不用些术语，但这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作者认为它应该和社会大众保持“零距离”。根据这一观点，本书从千家万户关心的高考作文和几百万受众瞩目的大众传媒“品三国”讲起，书中的语料大部分都是现代文，浅显易懂，十分实用，而且诠释具体细致，深入浅出，文笔也生动活泼，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可接受性。大学生、中小学语文教师和其他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读者都看得懂，用得上。

辞章体裁学、辞章风格学这两朵新葩，经过二十多年的培育终于开放，与语体学、文体学、语言风格学、文章风格学、文学风格学一起争艳吐芳于言语艺术的百花园，装点着中华文化明媚的春天。

是为序。

黎运汉

2008年重阳节

自序

2000年，福建师范大学申报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博士点，笔者被列为汉语修辞学与辞章学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之一。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申报获得成功。这给本人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于是笔者把在福建师范大学给研究生讲授汉语辞章学的讲义和发表的系列论文，整理成一百多万字的“辞章学论稿”。这么大的篇幅要出版，投资甚巨，只好分作三书：《辞章学发凡》、《辞章学起例》（“发凡起例”是一个成语，把它一分为二作为姐妹书的名称）和《辞章学流别》，分期推出。接着，本人三次赴台讲学，又应聘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其部分文稿给一个博士班、两个硕士班使用，反映良好。该论稿经修改充实后的“三书”如下：

《辞章学发凡》49万字，获福建省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已于2005年问世。此书是就汉语辞章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作阐释的，其对象是研究生。

《辞章学起例》，获福建省文史研究馆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为通俗计，改称《辞章体裁风格学》，分上、中、下编，上编简述建立辞章体裁学、辞章风格学的国学渊源、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与重大的社会意义；中编为“辞章体裁学”；下编为“辞章风格学”。此书旨在阐释辞体、辞风的理论体系及其运用的原则、规律和方法，其对象是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大学、中学语文教师。本书列为黎运汉教授主编的“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的第一期选题。

《辞章学流别》，从常格、变格、畸格三种语格和它们相互组成的九种关于语音、文字、词语、句子、辞格直至标点符号、图表等的变化规律（其纲要见《辞章学概论》第215~239页），探讨“语格辞章学”、“规范辞章学”、“常格辞章学”、“变格辞章学”、“图符辞章学”等五门分支学科，并编入“篇章辞章学”、“建构辞章学”、“文艺辞章学”、“新诗辞章学”、“史传辞章学”的纲要或书论。此书最通俗、最实用，大量引用定评作家名作的原稿与改稿（或初版与修订版）为例，它浅显易懂，生动有趣。其对象是大中学生及其他中等文化水平的广大读者群。

以上三书逐步通俗，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的台上走向实践的广场，逐步切合于实际运用。它们既相互紧密联系，又各自独立，形成了汉语辞章学的一个系列，以适应不同文化水平读者的需求。

每一门新学科（例如汉语辞章学、辞章体裁学、辞章风格学）的建立，都不能凭某些学者一时的主观愿望、心血来潮就把它建立起来。它是现实的需要，是历史的积累，是前贤今秀与广大读者协作的结果，包括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吸收。

每一门新的学科，必有它明确的研究对象、体系、性质、规律以及具体的方法，而且要概括出它总的理论框架来统率学科所有局部的理论及其规律和方法，形成有机的严密的整体。新的学科，还要有一系列而不只是一两个原创性的理论以及反映这些理论的科学术语，必须用新的研究方法才能解决新的问题。

二十多年来，笔者从《易经》、《老子》中吸取辩证法思想和系统论的方法，以“中华密码”和“融合”其综合与分析的整体性思维；以“四元六维结构”（简称“四六结构”）为理论框架（请阅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以“话语”为本位，对言语活动及其理论作动态的、多维的、立体的、辩证的分析。它不仅仅停留在静态的话语文本上，而且要把话语与客观世界（含自然界、人类社会、文化背景等）、言语主体（含说写者、听读者之世界观、才德、兴趣爱好等）作双向互动的联系。这些理论框架的雏形在拙著《辞章学概论》（第43~47页）中已作浅析，在拙著《文艺修辞学·导论》（第36~102页）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辞章学发凡》则用了更大的篇幅作深入的论析。这是“入古出新”，从中华本土固有文化中升华、总结出来的（见拙文《先秦修辞理论与“四元六维结构”》，刊于《艺文述林》（第167~18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同时也借鉴了西方对我有用的东西。凡是评及拙著的有卓见的专家，例如张静、王德春、宗廷虎、高万云、林大础和台湾的陈满铭等著名教授以及年轻的祝克懿、吴礼权、霍士通、罗非等杰出的教授、博士，无不高度肯定我中华民族之“四六结构”的理论及其组合的部件。这是辞章学（含辞体学、辞风学）原创性的理论。在这总理论的指导下，派生出了系列原创性的分论：辞章定位论、辞章定义论、辞章性质层次论、广义修辞论、三辞三成说、体、意先后说、辞章信息论、辞章表达（生成）论、辞章鉴识（解读）论、辞章双向互动论、辞章作用、效果论、四个世界论、常格论、变格论以及表心律、适境律、得体律、协格律、诚美律和化畸律等。这些理论对此前相关的修辞学理论，或者有所补充，或者有所发展，或者是前人未涉及的新论。上述“四六结构”论及其诸多分论，也是辞章学之分支学科辞体学、辞风学原创性的理论（《辞章体裁风格学》与《辞章学发凡》原来都是《辞章学论稿》的有机组成部分），为节省篇幅，本书不再重复，请读者参阅拙著《辞章学导论》、《辞章学新论》、《辞章学发凡》和笔者主编的合作书《辞章学辞典》、《大学辞章学》等。

古代汉语辞章学，是言语艺术的国学，现代汉语辞章学是古汉语辞章学的继承与发展，它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融合性。就整个学科而言，《辞章学导论》、《辞章学发凡》已对此作了阐释。民族性和融合性也表现在辞章体裁学和辞章风格学上。

辞章体裁学是以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的文体论为根基、为“实践体”（或称“微观体”），同时以借鉴、吸收西方的语体论为“导向体”（或称“宏观体”），在“功能”上把两者对接、融合起来的边缘性的新学科。这就既解决了言语体裁运用的“导向”问题，又落实在具体话语的生成与解读上；有“宏观”的指导，有“微观”的

实践。

辞章体裁的形成从“四六结构”讲是，服从于宇宙元（交际领域、语境）、表达元（说写的目的）及其企望完成的任务而采用适切的媒体（口语、书语或电语），运用得体的语音、词汇、语法诸语言要素和辞格、篇章、表达方式、艺术方法等超语言要素，形成“话语”（口语之“话篇”或书语之“文篇”）——“话语元”，传递给听读者——鉴识元。要给“辞章体裁”作类别的定性，就要通过综合思维，对“话语”整体所形成的“气氛和格调”、所实现的“功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为达到此目的，就必须配合科学的分析思维，并用数理方法作精确的分析。本书的“体素”、“体素值”、体素之“大值”、“小值”、“正值”、“负值”、“零值”、“增值”、“贬值”、“辞体坐标”、“辞体平面”、“12 辞体区”、“9900 辞体平方度”、“功能度”、“媒体度”、“话语辞体平面图”、“辞标”、“电脑辞典”、“得体律”等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应运而生，并结合实例作科学的分析。由此，区别口语、书语、电语三种媒体（传递信息的方式、形式）与实用、艺术及其融合的三种功能（交际的领域、目的、任务、内容）和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各自“三分法”所形成的对立统一的关系理论也产生了。辞体的解读也要从“四六结构”切入，它的方向和上述辞体的生成相反。这都体现了要融合其综合与分析的立体的、动态的整体性思维模式。

辞章风格学，也是以中华传统的优秀的“体性”、“风格”理论为根基，同时，又借鉴、吸收国外和当代语言风格学的先进理论，在“格素”的体系上，把两者融合起来构建的边缘性的新学科。这就不仅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有助于形成优良的风格，包括文风，也有助于对风格的欣赏和解读。

我们感到最具民族性，才具世界性；最具时代性，才具历史性；最具融合性，才具实用性。

广义的辞章风格学，包括辞章体裁学。为便于学习、运用，促进学科的发展，我们把它们独立出来进行研究，但它们都是汉语辞章学下位的学科，又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上述有关辞章学理论及其分论，都适用于狭义的辞章风格学。从“四六结构”讲，辞章风格是，植根于宇宙元（时代精神、社会风尚、地理环境、自然风光、民俗、风俗、民族气质、文化传统以及题材等），经过表达元（说写者的世界观、思想、感情、性格、情操、阅历、知识、文化修养、社会职业以至性别、年龄等），根据不同的语境、对象所要完成的任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和辞体结合起来），以形成话语元之风格的诸要素（内蕴情志要素和外现形态要素）综合所表现出来的总特征来感染、征服听读者——鉴识元。本书就用这种“四六结构”来论析辞章风格的形成论、制导论、优化论、鉴赏论、功能论、类型论，系统论析了几类风格的高下优劣，论析了七组优劣风格的辩证法及其适度原则，提出风格优化的原则、规律并指出具体的途径和方法，倡议要建立“风格优化学”。风格虽然抽象，但是本书揭示了风格的“物质基础”——“格素”，就使风格不仅可以“意会”，而且可以“言传”，揭开了风格

神秘的面纱，任何成功的话语，都与辞章风格“零距离”。

上述的融合，不同于木头和沙土的拌和，也不同于油和水的渗合，而是水与牛奶的交融，建构起自己全新的体系。“辞章是有效、高效地表达、承载并借以适切、深入地理解话语信息的艺术形式”，辞章以“四六结构”中的“话语”（话语元）为本位，它总是和特定的“客观世界”（宇宙元）、说写者（表达元）、听读者（鉴识元）联结成对立、统一的辩证的立体关系。这种“话语”总是融合着诸多方面、诸多系列的言语艺术。从书面语讲，它是语体和文体的统一体，是语言风格和文章风格的合成体，本书就是从这个“统一体”建立辞章体裁学；从这个“合成体”建立辞章风格学。

研究汉语辞章学、辞体学、辞风学，必须探赜索隐，正本清源，入古出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汉语辞章学、辞章史、辞章学史，辞体学、辞体史、辞体学史，辞风学、辞风史、辞风学史，都始于先秦。

我们试图建立这两门新学科，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首吃螃蟹，没有经验，满口还会吃出鲜血来，殷切地希望各界贤达批评、指导。

本书的写成，要感谢先贤今秀研究成果的滋养，国外先进理论的启发。在当前出书难的情况下，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给予出版资助，“顶尖级”的风格学家、暨南大学黎运汉教授给予指导、作序，责编杜小陆先生给予编校，暨南大学出版社给予出版，在此，一并致以由衷的感谢！

文体学、语体学、风格学滋养了辞体学、辞风学。今后，这几门学科都将各自独立，并“与时俱进”，继续发展，为语言运用、语文教学、形成良好的社会文风作出贡献！

郑颐寿

2007年夏于五凤山阳之榕兰斋

例 言

一、汉语辞章学及其分支学科辞章体裁学、辞章风格学都萌芽于先秦，建立于当代，蕴涵着极其深厚的国学精神，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当代之辞章学及其分支学科是古代这些学科的延伸与发展，又融入现当代相关学科的理论，包括借鉴外国对我有用的先进的东西，为今天中国的读者服务。为此，本书不得不探源寻流，从中华元典^①文化中探赜索隐，引用了先秦诸多有代表性的典籍，集中地见于本书上编第二章，中编和下编的第三章、第七章的文字和理论程度都较深，主要提供给研究生和相当文化水平的读者参考。对此，大学本、专科生稍作浏览即可。其他的章节，主要引用现当代的语料，浅显易懂，可供大学本、专科生、中小学语文老师和其他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读者作教材或阅读参考。

二、本书是辞章体裁学和辞章风格学的合编。上编为绪论，中编和下编依次分科论述。为了节省篇幅，中、下编有些相关内容，详略互补，互相呼应。

三、为了节省篇幅，凡是列为本书参考文献的论著和古代典籍，一般只出现文本名称，而不一一详注出版社、版次等。

四、辞章体裁学、辞章风格学是辞章学的下位学科。此书与拙著《辞章学发凡》属于一个系列，有关辞章学的学科宏观理论体系已在《辞章学发凡》中作了论析，本书不再重复。

五、本书有关古代辞章学理论，大量引自我们编著的《辞章学辞典》，它是学习本书的最重要参考材料之一。

六、本书不少章节，是已发表的系列论文或讲稿，文中重要的论点并不重复。而把它们汇编入书，前后文就可能重复。对于此类重要的学术观点，原则上不避复，一则保持原文的完整性，二则其论述的角度并不同，三则一再强调可加深读者的印象。

^① 冯天瑜教授将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的典籍称为“元典”，见其《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